

申江寻梦

一个老报人的文化情怀

· 海上帆丛书 ·

袁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海上帆从

申江寻梦

一个老报人的文化情怀

袁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申江寻梦:一个老报人的文化情怀/袁鹰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2

(海上帆丛书)

ISBN 978-7-5321-4045-9

I. ①申… II. ①袁…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1680 号

责任编辑:陈 蕾

美术编辑:钱 祯

封面题字:陆 康

申江寻梦

——一个老报人的文化情怀

袁 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39,000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45-9/I · 3122 定价: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目 录

第一辑 寻梦录

- 3 / 歹土梦魇
15 / “孤岛”当年毕业歌
19 / 铁蹄下祭扫鲁迅墓
23 / 天亮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前后在上海
29 / 普希金铜像下
33 / 遥想虹口当年
41 / 万木无声待雨来:60年前的上海记忆
45 / 暗夜里迎来第一道曙光:1949年5月25日上海纪事
53 / 汉口路309号
58 / 总要想起圆明园路
62 / 石库门之恋
65 / 梦里外滩

第二辑 心潮曲

- 73 / 红星照我
79 / 上海,我的1945
98 / 心上永远有春光:春节前夕寄给上海一位老友的信
103 / 思南路上的梧桐树
107 / 在上海遥望昆明:年前震惊上海的两次民主浪潮
114 / 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在上海
122 / 感激上海
142 / “姐妹团”:手足真情60年
156 / 华模中学之忆

第三辑 怀人篇

- 171 / 初识夏公在上海
196 / 讲真话：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
210 / 长夜行人路不迷
219 / 永远的“孤岛”情结：缅怀柯灵先生
226 / 老树婆娑：忆胡山源师
231 / 理解 60 年前的老师林汉达
235 / 姚苏凤：我的第一位报纸总编辑
241 / 长江风范：范长江同志留下的几个难忘印象
246 / 路过会乐里追思恽逸群
250 / 阿丹应有憾，未见审江青
259 / 西风凋碧树：记魏克明
266 / 从青春歌者到白发书生：怀念丁景唐
276 / 菡萏香消，无悔有憾：菡子远行五年祭
282 / 花环被过早摧残：想起闻捷，总是欲哭无泪
290 / 启明星没有陨落：怀念魏启明
298 / 后记

歹土梦魇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春天,我家住的上海沪西区,当时被称作“歹土”。前尘旧事,如雾如烟,只剩下淡淡的影子,也渐渐随岁月流逝,了无痕迹。但亦有许多梦魇,伴随着辛酸、屈辱、苦涩和愤慨,长留在记忆深处,像幽灵一般飘忽。这里记下的仅是其中几个……

梦魇之一:“歹土”

1938年3月的一个下午,嘈杂拥挤的上海北火车站,14岁的我随着全家老小,提了简单的行李箱笼,惶恐不安地走下沪杭铁路列车,踏上神秘而陌生的土地,从此在这个远东大都会一住就是15年。

抗战全面爆发的半年来,华北和东南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日本侵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当时还没有被完全揭露,但我们居住在杭州和江南许多

城镇的中国老百姓都已尝到异族强占下受凌辱蹂躏的痛苦滋味。上海的旧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于从不平等条约带来“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处于四周日军占领的包围中还暂时保留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净土,革命力量也凭借这个特殊环境坚持抗日爱国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复杂斗争,这就是当时以及后来被称作“孤岛”的特殊现象。从那时起,江苏、浙江、安徽许多城镇家庭,为了不愿在敌寇铁蹄下当顺民,纷纷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难到上海,好像“孤岛”是世外桃源。于是,“孤岛”上人口激增,住房拥挤,马路上弄堂里来来



1940年初中毕业时

去去,都是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北站、西站和十六铺轮船码头,每天接纳从火车轮船上蜂拥而至、神色慌忙的人流,又迅速将他们消化到千百条大街小巷的许多角落里去。当时有谚云:“走尽天边,不如黄浦两边。”

我们这八九口之家,就这样流进了沪西曹家渡一角:极司非而路(现名万航渡路)306号。住定下来,我就有点纳闷:这个蓝底白字的门牌很奇特,左邻右舍既没有305号,也不见307号,那个孤零零的306号从何而来?问原先住在这里的亲戚,他说这里是“越界筑路”,是租界和“中国地界”的接壤地段,本来并不在租界之内。租界当局为了扩展范围,向西修筑了几条马路,马路两旁的房屋,向租界管理部门纳税,就得到一个门牌号码,否则,就由“中国地界”的市政部门另排门牌。所以我们住的306号,还有另一个门牌号码:极司非而路1152弄(又因弄口有一家当铺而称典当弄)7号。这是我刚到上海感到的第一件新奇事。

这类“越界筑路”当时在沪西有好几条,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愚园路、忆

定盘路(今江苏路)、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等都是。在这些地区,治安卫生的情况极坏,抢劫、偷盗、打架斗殴、日有发生,拐卖妇女儿童也时有所闻。鸦片馆、赌场林立,流氓地痞横行。大小赌场,每到夜晚灯火通明,人影幢幢,门口有身挂木棍手枪的彪形大汉保镖站岗,门里吆五喝六,吵吵嚷嚷,通宵不息。租界里挂洋商招牌的报纸称这里为“歹土”。这个名词,形容彼时彼地沪西一带的社会面貌,真是准确之至。

“歹土”给我们家的第一件礼物,是父亲被剥了一次猪猡。“剥猪猡”是当时俗语,意即一两个流氓在偏僻的弄堂里截住行人,强行抢走他的大衣长袍,好像剥猪皮一样。还有一个“抛顶官”,是趁电车启动时突然抢走靠窗口坐的乘客的帽子,套在自己头上快步遁走,被抛了“顶官”的乘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帽子被抢走,只得自认晦气。那天黄昏,当银行小职员父亲下班回家,在弄堂里就被剥走一件夹袍。父亲是个懦弱老实的人,不敢反抗,只好忍气吞声,哭丧着脸回家。在只重衣衫不重人的旧社会,这件夹袍是他唯一一件稍为像样的衣衫,每天上班要穿的,为这件倒霉事他懊丧了好多天。同住的邻居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只能劝慰他:“你没有在发工钿的日子碰上这两个赤佬,就算额骨头高了。”父亲想想也对,若是一个月薪金被连带剥了去,全家一个月的生计无着,那可如何是好!

两年后我们搬到康脑脱路忻康里,那里更是具体而微的“歹土”。我家前门正对着一家鸦片馆后门,从早到晚,鸦片气味丝丝浮动在空气里。常常能看到一些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的烟鬼,猥猥琐琐地进出烟馆,或者蜷缩在门口台阶旁。有的掏出一支香烟在地上墩几下,再用长指甲挑一点白面(海洛因)塞进烟头上那小截空间,擦根火柴点着了,闭上眼睛尽力一吸,让毒品进入肺腑。这些烟鬼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可怜更可憎。那时听到一个传闻:烟馆同那些中毒已深的烟鬼订了合同,到他们付不出烟钱时就由烟馆免费供应,条件是死后(烟馆知道他们决活不长)遗体交给烟馆,烟馆将他们的骨殖再磨成粉掺在白面里,继续卖给别的烟鬼,因为这些人中毒已深入骨髓了。这传闻不知是否属实,我们听到时都不禁毛骨悚然,又信又不信。有些常在烟馆门口见到的烟鬼,不多几天就无影无踪,却是事实。不知他们的尸骨是被普善山庄拉走了

呢,还是被磨成了粉末?

忻康里是个大弄堂,住户很多,常常流传各种各样里弄新闻:哪一家的姑娘被人花言巧语骗去做工,却卖到妓院;哪一家男主人在赌场输得倾家荡产,夜里去跳黄浦江,债主还逼上门来讨债;哪一家男的出去跑单帮,老婆在家无法维持生活只好做“半开门”(暗娼)生意,被男人回来发现痛打一顿;哪一家老夫妻俩因为独生子被日本宪兵抓走杳无音讯,饥寒交迫,只好双双上吊……

租界里出版的进步报纸上,关于“歹土”的新闻,多数带有揭露性,有时也有公正的言论。大西路忆定盘路附近一家银都电影院,有一次公然上映一部赤裸裸的色情影片,名为《夫妇之道》,在报纸上登出挑逗性广告,竟然诱使许多观众大老远地赶去,连续客满,电影院大赚不义之财。社会舆论对这家电影院的恶劣行径同声严词斥责,报纸上斥为不是“银都”而是“淫都”。

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孤岛”被淹没在狂潮恶浪里,不复存在,整个上海从此就跟有的沦陷区一样,全都成为豺狼遍地、狐鼠横行的“歹土”了。

梦魇之二:“76号”

极司非而路的门牌很乱,但有一个门牌号在“孤岛”时期和以后年月里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就是“76号”。

“76号”在极司非而路康家桥往西,现在的镇宁路口马路转角处,一处旧式楼房院落。听说以前是国民党军阀陈调元在上海的宅邸,“八·一三”后宅主远去内地,就被敌伪占用。投靠日寇的原国民党骨干分子周佛海、丁默村在此处设立特务机关,充当敌人鹰犬爪牙,成为一座专门关押、杀害抗日爱国人士、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阴森魔穴,一座血腥的活地狱。

门口是荷枪实弹的警特,两扇黑漆大铁门终日紧闭,锁住门里一切恐怖、神秘和罪恶,像一只狰狞的猛兽蹲在路边,睁大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盯住每一个过往行人,似乎随时都会猛扑过来,一口吞噬下猎物。我每天从学校往返,路过它面前时必定绕到马路对面,快步离开,不敢停留。有一次刚走到它门

前,恰巧一辆汽车正开进去,大门启处,我在马路对面瞥了一眼,只见甬道里边还有第二道门,门口悬挂一块大木牌,两行小字下面赫然四个大字:特工总部。我正想辨清那两行小字,大铁门戛然闭上。其实,不看也早已知道它是“特工总部”,我只想弄清它的全名罢了。

那几年,“76号”不断在租界里制造绑架、恐吓、敲诈勒索和暗杀案件,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搅得人心惶惶,谈虎色变。在我们少年人的心上,也投下一道道阴影、一层层恐怖。

1939年秋季刚开学,我们的级任兼国文教师朱兆新先生在课堂上讲了一件事:《大美晚报》副刊《夜光杯》的主编朱惺公前几天被“76号”的暴徒暗杀。对当时仅是初中三年级学生的我们来说,朱惺公的名字本来很陌生,《大美晚报》我们也很少看。朱老师就介绍说这是一位很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文人,编的副刊许多读者都爱读。这个副刊上曾经刊登题为《民族正气》的“中华民族英雄专辑”,连续介绍文天祥、顾炎武、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又刊登过《汉奸史话》,将历朝历代屈膝投降异族侵略者的汉奸丑类的无耻面目,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爱憎分明,尖锐泼辣,读者当然会联想到今天的溥仪、殷汝耕、王克敏、梁鸿志直到汪精卫那帮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这样做自然遭到敌伪的忌恨,作为副刊主编的朱惺公,不断接到恐吓信警告信,两个月前,他又收到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再不收敛,就要对他“施行国法”云云。朱惺公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在报上公开答复了敌伪的威胁,朱老师回过身去,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这篇正气凛然的公开信的题目:《“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写完题目,朱教师声调铿锵地背诵了开头几句:“慨自国军西撤,孤岛四周,久已不闻国法施行矣。若果有国法在,安能容此辈小丑跳耶?”朱教师一诵三叹:“你们听!这几句话,像一把利剑,一上来就直刺敌类的心肝肺腑,多好的文章!”接着又背诵最后几句:“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所容!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背完又连声赞叹:“好文章!实在难得一见的好文章!掷地可作金石声啊!”朱兆新老师是常州人氏,平时爱穿一件淡褐色长衫,潇洒倜

悦,典型的江南才子模样。他最崇拜他的同乡先辈清代诗人黄景仁,可是今天在课堂上,却一点没有黄景仁当年吟咏“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那种穷愁潦倒的情怀,却像个慷慨悲歌的战士。我一看到朱老师在黑板上写的“……特工总指挥部”几个字,立即想起“76号”大门里那块白底黑字大牌子。“76”号!又是“76号”欠下的一笔血债!

两个多月以后,公共租界高等法院二分院刑庭长郁华又惨遭毒手。那时还很幼稚的我,对郁华先生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文学家郁达夫的长兄,一位正直爱国的法官。直到40多年后,在浙江富阳鹤山上拜谒了郁华先生的衣冠冢和茅盾同志题匾的双烈亭,特别是读了郁风大姐编的烈士遗著诗文和她自己撰写的文章,才对郁华烈士的崇高品质和生平事迹有较多的了解,也就对当年“76号”暴徒的罪行增添了愤慨。

最使我对“76号”戟指痛恨的是茅丽瑛烈士的惨死,就发生在郁华先生被害后仅仅20天。

茅丽瑛是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家里一直订《申报》,12月13日报上登了一条噩耗,标题是:“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昨遭枪击”!我看得目瞪口呆。从《申报》报道中知道她们职业俱乐部为了救济战区难民,举办义卖市场,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这种行动,打动了我们少年的爱国心。解放后才了解到她们同时还集资购买医药用品和生活物资,秘密支援转战江南的新四军指战员。然而她们的正义爱国活动,却遭到日伪势力的仇视,“76号”向茅丽瑛寄恐吓信,还附了一颗子弹,要挟她立即停止义卖市场,又威胁一些公司和团体不许租借场地给她们。好一个茅丽瑛!面对这种种种阻挠和破坏,她和同伴们义无反顾,排除万难,终于使义卖市场如期举行。“76号”下毒手了!12月12日寒风呼啸的晚上,南京路四川路口三声凄厉的枪声,茅丽瑛倒在血泊里。开枪的暴徒,窜进预先停在四川路上的汽车,沿北京路向西疾驶,一直开进极司非而路76号。茅丽瑛被送往山东路仁济医院急救,医生们尽力抢救无效,到12月15日,这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好女儿,为人民事业流尽了她的29岁青春生命的最后一滴血!12月16、17日两天,胶州路上人流不断,成千上万捧着鲜花纸花络绎不

绝地到万国殡仪馆瞻仰烈士遗容，行礼致哀，灵堂内外，一片哭泣声、哀号声。18日的《申报》上生动地记述了入殓的悲壮情景，记者报道说：“其情绪之哀伤，为鲁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那位记者先生一定亲身经历过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遗灵从这里启灵送往万国公墓时的场面。我们中学生消息不灵，根本不知道烈士遗体停在万国殡仪馆，否则下课回家时完全可以从胶州路走过的，我曾为此遗憾了好久。以后再走过“76号”门口时，总要从心底对它射出一支仇恨之箭，为茅丽瑛和一切在那黑铁门里死难的烈士们报仇！

上海解放前一年，我又住到沪西康定路原先的“歹土”上，又多次走过“76号”。这时已是蒋介石王朝风雨飘摇即将土崩瓦解之时，“76号”看起来也黯淡无光，它或许已预感到大厦将倾，自己的末日眼看就要来临，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了。

梦魇之三：封锁

大约1941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我去黄陂路一位同学家，回来时路过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小菜场，突然听到几声急促的警笛声，慌乱的人群立刻东奔西窜，像没头苍蝇似的。我停住脚步，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见开来两辆军车，跳下来一队日本宪兵，跟着一批巡捕们拉起铁丝网，断绝了交通。

糟糕！又碰到封锁了！

我立即拔脚快步走到路口，想趁铁丝网封口之前逃出去，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来不及了。旧小说里常用“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形容窘迫情状，我那时倒巴不得能成为“漏网之鱼”，可是转了几处，都已封口，漏不出网去，这才清醒地意识到：我和许多当时在场的无辜行人以及这一带的居民一起，都被封锁在铁丝网内了。

这种“封锁”，那几年频繁发生。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对他们怀疑有从事抗日活动的“延安分子”、“重庆分子”居住的地区，或是认定有秘密电台在发报的地区，常常突然实行临时的、局部的封锁，用铁丝网拦起来，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接着就按线索进行搜捕，直到获得战果或者毫无战果，再撤除封锁，扬长而

去。时间少则几小时,多则三五天或者更长些。在“歹土”范围内,由日本兵和伪军警直接动手,如果进租界封锁,就由租界巡捕配合日本宪兵进行。租界当局对中国老百姓如狼似虎,在日本人面前也只好俯首听命,怎敢不依?

老百姓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因为一遇到这种突然袭击,被封锁地区居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蔬菜却立刻有断档之虞,更不用说职工上班、学生上学了。有的好端端走在路上突然遇到封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打电话告诉家里都不可能,害得全家寝食不安,连打听都无从打听。

我这次还算幸运。一是被封锁在小菜场,时间又是下午,小菜场里卖点心的尚未收摊,我算算口袋里的钱,吃碗阳春面和几只大饼还是够的。二是央求了一家烟纸店让我打个电话给邻居,请她转告我父母,让他们放心。然后,坐在一家小吃摊上,吃一碗面,又吃一客生煎馒头,耐心等待。心里有点懊悔刚才没有从同学处将他那本普希金的诗借来,可以仔细地读两遍。三是被封锁的时间不长,到晚上七八点钟撤除封锁,赶紧乘电车回家。家里人虽然知道我被封锁在小菜场,也还是忧心忡忡,祖父已经用他的几枚铜钱卜过几卦,一再说卦里没有凶象,不碍事的。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住在忻康里的时候。同住的沈老伯的大女儿沈宝琴和女婿方莹正准备到大后方去,联系好带他们离开上海的人已约定日期。不料启程的前一天突然遇到封锁,弄堂铁门紧闭,从铁门缝里向外张望,只见康脑脱路、极司非而路,星加坡路(今余姚路)一带马路上寂无一人,日本兵来回巡逻,如临大敌,不时还见到兵警押走一两个人。沈老伯他们和我们都挤在铁门内,惴惴不安。方莹两口子自然心急如焚,不知何时才会撤除封锁,又无法通知联系的人,如果失约,去大后方的事就成泡影。他们小声商量好久,想出一个办法,塞钱给管铁门的人,求他们通融开一条缝,他俩快步越过马路,趁巡逻的日本兵没有发觉时跑到马路对面一条小弄堂里,再从那里绕出去。

这样做自然有危险性,如被日本兵发觉,后果不堪设想。但事已至此,他们只能冒一次险。管铁门的人总算答应帮忙,悄悄拉开一条缝,小夫妻俩一人提一个手提包,三步并两步横越空无一人的马路,直奔对面小弄堂。没想到门缝一开,后边接着又有三四个人紧跟着奔过马路去,急促的脚步声惊动了刚巡

遛过去的日本兵，哇哇叫几声，回身追进小弄堂去。

铁门里紧张望着的人，不约而同惊呼一声“啊哟”！沈老伯顿时面色如土，连声说：“完了！完了！”两分钟后，就看到方莹夫妇和另外几个逃出去的人都被日本兵从小弄堂里押解出来，进入一家店堂。方莹走在前面，回头看到妻子垂头跟在后边，好像两腿发软，走不动路，就停下来扶住她。

到了这地步，继续站在铁门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就劝沈老伯不如回去等待。沈老伯回到家里，坐立不安，不一会就下楼到我们家来，不住叹气：“这下完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的父亲除了空言相慰，又能想出什么办法？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一小时后，他的女儿女婿竟双双被释放回来。原来审讯很简单，问他们为什么要跑出去，他们回答是家乡老人病危，要赶回去探视。敌伪军警从他们身上和手提包里搜不出什么违禁品，只好训斥一顿了事。我们都说：“真是万幸万幸。”

今天的读者能理解吗？在残暴的刺刀下失去了人身自由和行动自由，还沾沾自喜认为是“万幸”！

梦魇之四：花会

每天黄昏时分，沪西那几条马路上总有一小批人分头急急忙忙地奔跑，一面跑，一面大声嚷着：“黄坤山！黄坤山！”或是“郑必得！郑必得！”他们跑过以后，路边那些经营打花会的小店，就赶紧收下挂在店门口的粉牌，抹去牌上原先写的字，改写一个大大的“坤”字或者“必”字，等候在店门口的另一小群人，就分头散去，进入弄堂小巷，告诉买主，是赢了还是输了，输的叫做“吃烧包”。就跟任何赌博一样，“吃烧包”的人必定是多数。即使今天侥幸赢了一回，明天、后天总要输的。

“花会”是一种民间赌博，据说本世纪初源于广东香港一带，传到上海时，原在虹口区广东籍居民中盛行，后来才传到沪西的。它有点像赛马和彩票，却比它们简便。它分36门，36个人名，分别是十二生肖的“精”，如黄坤山是老虎精，郑必得是鼠精，张有利是蛇精等等。每天黄昏，在曹家渡五角场附近的一

个什么地方开彩,固定由一个类似四川帮会中“龙头大哥”的人来打开供在香案上一个盒子,里面放着预先写好的一个名字,每天开一次。打花会的人,如果正好买着这个名字的,就算打中了,一赔二,一赔五,或是一赔十,看你买的哪一种,打其他 35 门的任何一个,都吃了“烧包”,输赢的比例是一比三十五,明摆着是座吸血害人的火坑。

但是,参加这项赌博活动的,并不是那些进出赌场千金一掷的赌徒,更不是腰缠万贯的豪商,而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城市平民、女工和女佣。许多人简直着了迷,如同吸鸦片上了瘾,明知面前是火坑,也心甘情愿往下跳,一次次将辛辛苦苦攒起来的血汗钱,交给“航船”(专业经手人),奢望能中一次一赔十的彩,哪怕是一赔二的微利,也好贴补家用,应付天天飞涨的物价。她们小心翼翼地捏着钱交给熟悉的“航船”,说明打哪一门,“航船”就写个小纸条给她,上面写个“坤”或是“必”、“利”字,晚上开彩了,再来告诉她,打中了就给她钱。有的人觉得交给“航船”不可靠,会泄露了她的秘密,就亲自偷偷到路边小店去买,其实结果都一样。

打花会的妇女,大多是瞒着丈夫偷偷地干的,天长日久,许多家庭悲剧、人间惨事都由此发生了。

打花会的人,总认为 36 门之中只能中一门,既不像跑马跑狗那样亲眼得见,又不像麻将牌九那样凭手气和牌技,那么冥冥之中必定有神灵在主宰。于是烧香拜佛、打卦测字就成了她们预测吉凶的最佳途径。我们那个异堂里,每天下午,一听得“叮——当,叮——当”的小锣声传来,总会有一些妇女悄悄打开后门,围住瞎子算命先生,多数都是问打哪一门好。有的怕别人听到,泄露天机,就将算命先生拉到自家门口,轻声相问。算命先生呢,从不轻易明确答复,他怎能算得出呢?而且算得准不准,几小时后便知分晓。他只好含糊说两句模棱两可的话,或是避实就虚,好言规劝:“阿嫂,你的命里缺偏财,不必再把钱朝水里扔。”这种答复当然不能让那位阿嫂满意,等算命先生走了,就骂他一声滑头,又不敢让他听见,明天还指望他能口吐真言来帮助自己翻本哩。

同里弄有位叫秀娥的少妇,是从扬州乡下逃难来上海的,丈夫跟同伙跑单帮,她带着三岁的小女儿靠缝穷度日,每天吃六谷粉(玉米面)咸菜,日子过得

极艰难。迷上了花会以后，秀娥三天两头都要交给那个大烟鬼一样的“航船”一点钱，偶尔打中一两次，多数都是有去无回。手边一点可怜的钱输完了，就借债，债越借越大，小女儿出疹子，也没有钱看医生。不知什么人给她出个主意，买一副香烛，将列满36门名字的花会纸铺在香烛前，又让女儿喝两口烧酒，睡得昏昏糊糊的时候，抱起孩子在小手里塞一支香，到纸上去点，摇摇晃晃地点到了一个名字。她就将身边所有的钱再加上印子钱借来的，按点到的那个名字打了一赔十。眼巴巴等到晚上，大烟鬼带来的仍是个坏消息：又吃了“烧包”！秀娥一听，双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直到邻居听到小孩的哇哇哭声，推开她家门一看，只见秀娥僵直地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小女头的手掌被香头烧得皮焦肉烂。第三天她的丈夫回家，躺在床上的是神经错乱的妻子和奄奄一息的女儿。小伙子坐在门槛上放声大哭，几位好心的邻居也陪他抹了半天眼泪。

我的母亲是位贤妻良母，克勤克俭，操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她有时也爱同亲友邻居玩玩小麻将，总是适可而止，并不嗜赌，更不敢玩大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受不住邻居章师母的怂恿，开始打起花会来。她没有那么多余钱，只能从日常家用款中取出一点点，上海话叫“小弄弄”。目的无非找点外快，多买点菜让全家开开荤。“小弄弄”也逃不脱输多赢少的规律。寅吃卯粮，家用账就渐渐有缺口。父亲隔些日子就要翻翻账本，倒不是查账，而是帮助母亲结算收支，看看有没有还可以省下的用项。好在帮母亲记账的是我，我自然不能照实记下“付打花会三角”，隔两三天就记一笔“付零用八角”之类，以求平衡，不露破绽。我很希望母亲能中一回一赔五或一赔十的彩，无奈这种好运始终未曾出现过。我也劝过母亲洗手不干，她总是不置可否地笑笑，仍是悄悄继续跟着章师母和别的邻居白送钱给“航船”，很有点无怨无悔的劲头。有一次她竟拿出一块钱打“郑必得”，且是一赔十的。我吃了一惊，问她今天为什么如此果断，平时她总是左顾右盼，迟疑不决打哪一门。她笑笑说：“今天是你生日。”我恍然大悟，我是属鼠的，她认定今天打郑必得这个鼠精必能得到好运，结果可以想见，又一次吃了“烧包”。两天后我再记一笔“零用”虚账时，不禁脱口说一句：“早知道又吃烧包，还不如索性买一斤肉吃一顿红烧肉哩。”回头看见母亲

闷闷不乐的样子,我马上失悔不该冒冒失失说这句玩笑话。母亲平时整日辛劳,为全家人衣食操心,很少休息,更少娱乐,玩玩小麻将也是偶一为之,所谓“小赌怡情,大赌乱性”,她从不赌。用零钱打打花会,也可以算是乱世生涯中一点小小乐趣吧,又何必给她再增加一分懊丧呢?细心的父亲未尝没有察觉母亲的小秘密,却从未提过一字,装作懵然不知。母亲去世前几年,有一次不知怎么偶然闲谈起当年在上海打花会,我说到那年“郑必得”鼠精事,母亲有点惊讶:“你还记得呀?”接着就随意说出几个什么“精”的名字,原来老太太记的比我清楚得多,她说的那几个名字,我今天也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

1997 年深秋